

从水路、旱路到生态路：

道银村的未来之路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



道银生态考察图。

本版图片由鹦哥岭保护区提供

位于鹦哥岭大山深处的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高峰村委会道银村，至今未通公路。进出村子的路有2条，一条1米宽的羊肠小道，来回50多公里，谓之旱路；一条循南开河而上的水路，长度相差无几。虽然2条路都是风景秀丽，却都崎岖无比。几年前，道银村甚至连旱路都没有，村民到山外，唯有一路涉水而行。山里的山货、山外的生产生活资料，运出运进就很费劲。

不仅路不好走，连通讯都是大问题。道银村17户人家，93口人，聚居在2个自然村里，即道银和力土。两个自然村都没有固定电话，道银更是封闭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，要打电话必须拿着手机跑10多分钟到力土去。

因此，在道银村民的眼中，路，就是他们的命根子。

由于交通不便，村民的生活水平就无法跟上来。1950年代末，政府动员道银村民搬迁到了山外的白沙一个乡镇，给他们划拨了数百亩土地。没想到，当地村民认为道银人抢了自己的土地，时不时与他们发生冲突。几年后，在老村长的带领下，道银人被迫采取分步撤离的办法，先将牛赶回道银老村，然后在一天晚上全体拔营而归。

时光转到1980年代，生计赶不上时代发展的道银人再次面临搬迁。在政府的劝说下，道银村又搬到了白沙另一个地方。遭遇则与前次类似，而且时间更快，2年不到全村人又在村长的带领下搬回了道银。

2010年，政府希望再次动员道银人外迁，结果遭到斩钉截铁的拒绝。不仅因为道银人对前两次外迁教训的记忆深刻，更因为两年前，他们完全靠自力更生，经过8年的努力，终于修成了一条旱路。这意味着道银人到山外不用再怕弄湿脚，甚至可以用上摩托车这种“先进”的动力交通工具。

有了这条旱路，道银人终于可以用摩托车托着山货、橡胶片出山卖个好价钱，然后，顺带捎回山里急需的生活用品。于是，一路晃悠着、怒吼着冲上山坡又疾驰滑到坡底的摩托车，就成了这条山路上的一景。

水路、旱路并进的道银人，并没有满足现状。在鹦哥岭保护区和香港嘉道理农场的帮助下，他们开始琢磨着修建另一条新路：生态发展之路。

2007年，在保护区科技人员的长期宣传教育下，道银村率先在流经自己村庄的南开河上建立了禁渔区，全面保护这里的淡水鱼资源。在护林员符国华的带领下，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了这条长约2公里的禁渔区河段。只见小鱼成群浮在水面，一尺多长的大鱼潜在深水，隐约可见其“巡航”的气势。不时，还有鱼儿跃出水面，溅起片片水花，铺开串串涟漪。

符国华自豪地说，过去村里人总是想尽办法毒鱼、炸鱼，掠夺性捕捞使这里的鱼类资源遭到很大破坏，几十公里的河段里甚至很难见到一条手掌大的鱼。“如今好了，出了禁渔区我们也能捕到大鱼了。”他笑着说。

道银自主设立资源保护性的禁渔区，在海南省还是第一次。周围的村庄看到了，纷纷向保护区提出要设立禁渔区。目前禁渔区已经推广到了鹦哥岭不少地区。

道银村不仅在设立禁渔区的事情上走在了前头，由于被保护区当做可持续发展的试验田，村里生态生产和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周边社区的前头。

村里的道路虽然是泥土路，却很干净。走在道银村里也闻不到想象中的猪粪、人粪等难闻气息。符金海说，这多亏了保护区搞的生态农业示范项目。2007年7月开始的该项目，为道银村修建了第一个堆肥环保旱厕和软床猪圈，此后几乎推广到家家户户。这不仅结束了村中无厕所的历史，而且因为旱厕几乎没有臭味；而散放的生猪又被收回软床猪圈圈养，因此显著改善了村中的卫生环境。

与此同时，保护区还与香港嘉道理合作在道银示范建立草猪饲养系统、农林复合耕作模式等，帮助当地群众以减少用水量、提高农家肥使用率等措施，增加单位面积土地的生产效益，减轻群众生活对所在森林的压力。

最让人惊讶的是，道银与高峰全村一起成立社区保护协调委员会，在高峰村的委员会停止运作后，该村的分会却依然运作良好。通过这个委员会，保护区在道银成功开展了农业培训，还组织村民去儋州两院和兴隆进行农业生产考察。考察的一个成绩就是村里如今家家户户种植果树，而这在以前的道银是从来没有过的。通过该委员会，保护区还向村民发放了木材、大米、果苗、奖学金等。

委员会开展最成功的工作，莫过于发展生态考察游。在名为天下溪的NGO资助下，村民符金元被保护区派到江西鄱阳进行生态导游学习。此后，他便成了村里的专职导游。

符金元说，去年仅半年时间内，就有5拨分别来自港台与内地的生态考察旅游团来到道银。道银人按照每人每天150元—200元进行旅游收费。收到的钱由委员会根据各家提供的旅游消费屋子和服务的价值，进行分配。多余的钱，则留作村里的公共建设。为此，他们还选出几个人，分管钱、物和社区服务中心，而由村长管全面，一个村民全程监督。

“游客来了，赚到钱，全村人分。账目清晰，大家都满意。”符金海的笑容，正说明道银修筑“生态新路”的工作进展顺利。■



简单易懂的禁渔区宣传画。

一个保护区的护林社区梦

(上接B5版)

“由于整天在水田里跑，鸭子很健康，鸭肉好吃，市场上抢着要。”王宏耀算了笔账，稻鸭共育能够让他家的3亩田每年多挣超1500元。如此一来，群众信心大振，积极主动参与到各类示范项目中来。

保护区科研科科长王合升介绍说，2008年底，保护区、嘉道理与县乡两级政府开展的农村循环经济模式计划落户红新村。农业专家制定了项目总体规划，工作人员经常与村民座谈，鼓励部分村民尝试软床猪圈、稻鸭共育、旱厕、垃圾分类、农林混种等农村可持续经济发展项目。他们期望村民在看到收益后，能逐步接受这些计划。

保护区还为村民修建了集会用的茅草顶凉亭，并为示范项目立下环境解说牌，帮助村民进一步了解项目，也为后期公众教育作准备。作为呼应，教育小组亦将“垃圾分类”和“小菜园”等项目引入小区附近的学校，冀望让永续概念植人心。

在充分分析周边地区致贫的因素后，保护区提出了周边地区脱贫致富的政策思路。一是配合各级政府及社会的扶贫力度；二是考虑到保护区自身力量有限，通过示范式、引导式而非输血式扶贫的办法，帮助周边地区经济发展；三是通过劳动力的转移缓解周边社区人口日益增长对保护区的压力。

而劳动力转移有两种方式，一是推动当地教育发展，让学生通过考学、掌握更多知识的途径，以自己的能力走出大山。二是保护区尽己所能聘用了当地人为护林员，吸纳了约200名劳动力就业。

道银村护林员符国华，以前主要靠打猎挖山货来谋取现金收入，1年才数百元。如今做护林员，1个月就有固定收入1400多元。

新困惑

便文村最近开了一次村委会会议，内容是新农保，村支书王业才却先讲了个外地人捕鸟在便文被抓的事件。

以录音机模拟鸟叫来诱捕鸟类，是一些不法商贩常用的手段。那天，四五个外地人开着摩托车进入森林，将录音机放在布袋里，放出模拟公画眉的叫声。由于公画眉叫声好听，长得又漂亮，所以能诱使无法分辨的母画眉来自投罗网。两只画眉鸟就这样被抓。村民王秀梅发现后，立刻报告村委会，村委会通过电话、广播，召集了好多村民一起出动，终于把这几个外地人给截住了。

王合升觉得，这是当地环保教育取得显著成果的一个典型案例，“便文村坚持大会小会讲环保的作用很大。”

“保护区建立前，我有10多年没在村边见过野猪脚印了。”王业才说，现在村子靠山边到处都能看到野猪足迹。这种生态恢复的喜人景象，如今在保护区很多地方都能看到。

然而鹦哥岭管理站副站长刘磊觉得，要实现和谐护林社区的梦想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今年来陆续发生的一些反复性事件，在增添他和同事的困惑的同时，更坚定了他的这一看法。

保护区拨钱支持村里发展，村支书却不肯签名要这笔钱。这是发生在高峰村的咄咄怪事。

我们把目光回溯到2008年7月。当时保护区、嘉道理与高峰村委会协商，成立了鹦哥岭高峰社区保护协调委员会。委员会成员由乡干部、村民代表、保护区工作人员组成，下设自然村管理小组，每个管理小组3—4名成员。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协调社区生活、生产对资源的利用与森林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，共同探索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式，促进社区经济发展，提高社区群众的生活水平。

“成立这一委员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区共管。”刘磊说，这是保护区设计好的迈向和谐护林社区的必由之路，高峰村是第一个试验的村子。然而，委员会在运作2年后，在拨款及其使用方式上，保护区却与村支书产生了矛盾。

“我们希望拨款跟项目走，由委员会掌控；而村支书则希望钱不跟项目走，由自己掌管。”王云鹏说，原来签订协议时，商定保护区2010年起每年拨付村里的7.8万元中，3万多用于帮助特困生、奖励优秀生，4万多用于发展农业生产。由于委员会没有法人资格，只能通过村委会下发款项，而村支书是村委会的法人代表，他不签约这笔钱没法下拨。委员会也因此于今年1月宣告解散。

目前，保护区采取的对策是，将钱以奖学金、农业补助等方式直接发到村民手中。

令刘磊们困惑的还有：村民外出考察引进的香草兰因气候不宜，种植不是很成功；有些村庄的稻鸭共育，在保护区不再提供鸭苗后陷于停滞；旱厕、软床猪圈等在经济较好的村庄不受欢迎；以及上述公益活动，在保护区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保障收支平衡；等等。

针对这些问题，保护区开始摸索新的对策。例如，改种香兰草为种林下牧草；将旱厕、软床猪圈等放在偏远山村推广。此外，针对稻鸭共育出现的问题，保护区新的要求是，提供10只鸭苗待成长后村民必须上缴一两只成鸭，从而增加村民动力，力争收支平衡。

周亚东说，鹦哥岭周边地区的贫困表现出长期、持续性的特点，因此其彻底解决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，有些反复也是必然的。必须正确把握脱贫致富与森林保护之间的关系，避免急功近利式的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的发展模式，是周边地区在脱贫工作中必须掌握的原则。

“一个新保护区的诞生后，只要找到了办法，不断摸索前进，就必然会迎来越来越大的希望。”周亚东说。■